

漢語「兒」音嬗變新探

楊若薇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張本楠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北京話和北方方言中的兒化韻是漢語語音中獨一無二的特殊現象。兒化韻詞尾的「兒」，打破了漢語以音節為基本單位的原則的束縛，不再構成為一個獨立音節，成為僅僅附著於被兒化音節末尾的「音彩」音素。它的發音方式，也與漢語系統的讀音規則截然不同，成為例外的捲舌韻母。「兒」作為獨立音節的讀音，在中古以前與今日判若二音。「兒」經過了脫胎換骨的改變之後才成為今日的面貌。「兒」的這些特殊性，引起了中外諸多語言學家的研究興趣。兒化韻及「兒」音的歷史演變，不但是漢語語音史研究上的一個饒有趣味的課題，也是現代漢語的審音及語音規範化的重要歷史依據。

一、關於「兒」字譯音史料的考察

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結果，漢語「兒」字以及今日與它讀音相近的一系列字，包括《廣韻》支部的「兒」、「爾」、脂部的「二」、之部的「而」、「耳」、「餌」等字的讀音，從中古開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對於「兒」在中古或以前的音值，雖然至今仍是眾說不一，但有一點卻是學界公認的，即「兒」系列字在中古或以前，從未有過捲舌的音值。也就是說，「兒」系列字是在中古以後，由不捲舌音變作了捲舌韻。那麼，「兒」音究竟何時變作了今日的[ɛr]讀音？

「兒」音的變化是隋唐以後才產生的，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一音變究竟發生於何時？學界卻有不同的認識。自本世紀三十年代唐虞提出遼金時代說之後，又有南宋說、元代說，以至於近年李思敬提出的明代前期的說法。¹

語音考古研究，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此乃因古無錄音設施，語音則一現即逝，讓人無以對證。即使有豐富的音韻史料，研究者仍不免臆測之嫌。為了能夠令語音考古更加接近歷史真實，音韻學家開闢了許多路徑，除了以今日方音參照古音之法，以求用活化石敲開古音重門之外，更有以中外譯音來弄清古代音值的方法。這是因為，一方面在

¹ 李思敬：《漢語「兒」[ɛr]音史研究》，增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42。

歷史上漢語借用了異民族語言的詞語，另一方面異民族也借用了漢族的詞語，這兩方面的譯音材料恰可以相互參照、考訂，以求更真實地再現古漢語的語音。

唐虞在三十年代著文〈兒[ɛ]音的演變〉便採用了這一方法：「就外國古來傳述之中國語而觀其切音之如何；就中國古來音譯之外國語而反求原語之發音。」² 由此，唐先生為自己的方法，找到了「兒」[ɛ]音出現於文獻記載中的最早的證據，即遼代已出現了用「兒」[ɛ]音來對譯外來語的材料。

唐文中引用了《遼史》、《元史》中有關有「兒」的外來語譯名，從而得出的結論是：「拿『兒』『耳』『爾』等字對譯 r 音或 l 音自遼以來已經找到直接的證據了。」³ 這就形成了在探討「兒」[ɛ]音始生年代問題上的眾家之說中，時代最早的所謂「遼金說」。唐先生所運用的方法無疑是正確的。不過，遺憾的是，由於他對史料有欠考據，以至於運用了不正確的材料，遂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

兒[ɛ]音產生的時代，是探討其音變過程的前提。我們先就此問題做一番考察。茲將唐文所排列之《遼史》資料照錄如下：

起兒漫（《遼史》卷六十九頁七〈部族表〉）

起兒漫就是現在波斯的起兒米內（Kermineh or Kermaneh）在撒馬兒干和不花刺之間，在中古時是歐亞往來必經之孔道。《海敦紀程》把它譯作 Kerman。

葛兒罕（《遼史》卷一百一十六頁三〈國語解〉）

葛兒罕是漠北君王稱號也譯作菊兒汗或菊兒（《元史》卷一〈太祖本紀〉）闊兒汗（《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麥里傳〉）和菊兒可汗（《元聖祖親征錄》）。依賓愛爾阿梯兒記哈刺契丹把這名字譯作 Gurkhan。盧白魯克《紀行》譯作 Coir-Khan。志費尼《世界征略家傳》譯作 Gurkhan。拉施特《史記匯編》譯作 Gurkhan。

畏吾兒城（《遼史》卷六十九頁七〈部族表〉）

畏吾兒也譯作畏兀兒是當時一個種族的譯名。勃拉奴克劈尼《游記》譯作 Huyri。志費尼《世界征略家傳》譯作 Uighurs。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東方諸國風土記》譯作 Yogurs。拉施特《史記》譯作 Uighurs。

值得注意的是，唐文在引用了上述三條《遼史》的材料之後，接著引用的便是《元史》上的二十八條材料。那麼，金代的情況如何呢？不得而知。既然遼朝已採用了

² 原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年），頁457-67；現據李思敬：《漢語「兒」[ɛ]音史研究》附錄，頁159。

³ 同上注，頁166。

「兒」對譯 r，之後的元朝更是廣用「兒」的 r 譯音，按常理，承遼之後，啟元之前的金代，當是兒的[ɛ]音的發揚光大時期了。可是，不但唐先生未能舉列任何金代使用「兒」字對譯的證據，就是筆者在洋洋一百三十五卷的《金史》中，也遍尋不獲一個「兒」的譯名；即使在金人留下的文集、雜記和其他文字記載中，也照樣覓不到「兒」字譯名的蹤影。這不能不令人置疑：「兒」在漢語系統中的音變發生了甚麼故障？何以會出現這種戛然而止之後，元朝時卻又東山再起的怪異現象？這使我們不得不回頭檢討一下唐先生從《遼史》中所擷取的史料。

唐先生在文中所引用的「兒」譯名的史料，兩條來自《遼史·部族表》，一條來自《遼史·國語解》。《遼史》之編撰，向以倉促、草率著稱於世。當時元朝史臣以既有的遼人耶律儼《實錄》、金人陳大任《遼史》為底本，又參考了十分有限的資料之後，加以修訂編排，前後只用了十一個月時間（至正三年四月至四年三月）便令今日所見之一百一十六卷《遼史》問世。其中疏漏、訛誤、舛牾之處，每每可見。故今人治史而使用《遼史》之資料，不得不謹慎再三。

考《遼史·部族表·序》，可知該表為元朝史官自〈紀〉、〈傳〉所記，摘取有關資料拼成，並非耶律儼《實錄》、陳大任《遼史》所原有者。考《遼史·國語解》，其〈序〉言：「今即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可見，此〈解〉亦出自元朝史官之手筆。既是自「本史」中摘取資料，且看「本史」又是如何情形。

這三個「兒」譯名，均出自《遼史》卷三十〈天祚帝紀〉所附的「耶律大石」條。⁴《遼史·天祚帝紀》為元人草率拼湊而成，前人已有所論證。元朝史官不加考證，自《契丹國志》中摘取部分內容填充了該〈紀〉的部分篇幅，已是證據確鑿。⁵據此推測，該〈紀〉其他內容也可能是拼湊當時的現有材料而成。可是，元史官究竟是從甚麼史料中斷章取義組成了「耶律大石」條，今日已無從考證。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耶律大石」條絕非出自遼人之手（其實，耶律大石建西遼已是遼亡之後事，即使有關記載出自西遼人之手，其時期亦非屬遼代）。可見，唐先生所據以證明遼朝便出現了以

⁴ 「畏吾兒城」之名在《遼史》他處無所見，可是〈部族表〉將二十四個部族譯名單獨列表附於該卷之後，應表明其史源與前表不同。〈天祚帝紀〉「耶律大石」條記載耶律大石西奔會七州及十八部王眾，其中這十八部名稱及耶律大石所經的另外四地的名稱均出現在〈部族表〉中，只有「回回大食部」與「畏吾兒城」並未出現在〈天祚帝紀〉中。但由於「畏吾兒」一語在遼金均無出現過，所以，可證明是元史臣所造，可能據〈天祚帝紀〉中「回鶻」之名改譯。〈天祚帝紀〉「耶律大石」條還有其他用譯音「兒」例，如「牀古兒」、「密兒紀」、「紮而畢」、「忽兒珊」、「虎思斡耳朵」等，均與通篇《遼史》風格迥然不同，而與《元史》極為相似。

⁵ 見馮家昇：《遼史源流考》，收入趙鐵寒（主編）：《宋遼金元四史資料叢刊》（臺北：大華印書館，1971年），頁617-19。

「兒」對譯 r 的史料，非遼所屬，乃元人之物也。由此，唐先生的兒[er]音始於遼代之說，當不攻自破了。

同樣成書於元朝的《金史》，主要是根據金人留下的史書編成，其譯名中沒有一個「兒」字出現；金末邱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載了大量長春真人西行拜謁成吉思汗所經之處的地名、部族名以及所見之外族人名，亦均未使用過「兒」字來對譯外音，足以證明在金代，「兒」尚未進入對譯 r 的階段。

《元史》中觸目皆是的「兒」字譯音，已顯示「兒」以前所未有的姿態登上了漢語翻譯舞臺的這一事實。除了唐先生在其文中列舉的《元史》中二十八條地名譯音中採用「兒」的用例之外，以下略舉元代各種史料中俯拾皆是的眾多例證。

一、地名譯名

額兒古涅河(arkūneh)，蒙文ergūne。《蒙古秘史》141，144等節譯作「額湏古涅河」，《元史·孛秃傳》譯作「也兒古納河」，即今黑龍江上源額爾古納河。兀兒失溫，蒙文urši'un。《蒙古秘史》譯作「兀兒失溫」，即發源於貝爾湖而注入呼倫湖的鄂爾順河。

忒耳迷(tirmiz)，城名。位於暗木北岸，離蘇爾漢河口約十餘里。《元史·地理志》譯作「忒耳迷」；《聖武親征錄》作「迭兒密城」。

二、部族譯名

塔塔兒(tātār)，《蒙古秘史》、《元史》(《太祖紀》等)均譯作「塔塔兒」。
禹兒勤(yūrkin)，《蒙古秘史》133節譯作「主兒乞」(他處又作「禹兒乞」、「主兒勤」)；《聖武親征錄》譯作「月兒斤」；《元史·博爾朮傳》譯作「要兒斤」。

三、人名譯名

塔兒忽台-乞鄰禿黑(tārquṭai-qiriltūq)，《蒙古秘史》72節譯寫作「塔兒忽台-乞鄰禿黑」；《聖武親征錄》作「塔兒忽台-希憐禿」。

拙赤-合撒兒(jūji-qsār)，《蒙古秘史》60節譯作「拙赤-合撒兒」；《元史》、《聖武親征錄》譯作「搠只·哈撒兒」。

脫端-塔忽兒赤(tahūrçi)，《蒙古秘史》譯作「脫朵延-吉兒帖」；《聖武親征錄》、《元史·太祖紀》譯作「脫端-火兒真」。

四、其他譯名

保兀兒赤(職名。廚子、司膳者)，拉施特《史集》記作bāūrçi，蒙文bagursi。《蒙古秘史》124節譯作「保兀兒赤」；《元史·兵志》譯作「博爾赤」；《聖武親征錄》、《元史·失里伯傳》譯作「寶兒赤」。

速古兒赤（職名，後成為稱號，撐傘蓋者），蒙文šikürči。《元史·兵志》譯作「速古兒赤」。

槐因-亦兒堅（泛稱森林民），拉施特《史集》記作hūiin-irkān，蒙文oi-yin irgen。《蒙古秘史》239節譯作「槐因-亦兒堅」；《聖武親征錄》譯作「火因-亦兒幹」。⁶

《元史》是明朝初年所修，據以成書的資料是元朝遺留下來的數量官修典籍。《元史》自首卷首頁〈太祖紀〉一開宗，「兒」字譯名便亮了相，然後不斷出現，直至二百一十卷的《元史》終了。《元史》首頁就出現的「兒」，是音譯了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孛端叉兒」。如果按每代二十年算，從成吉思汗出生的1162年上溯二百年，⁷ 960年左右，則正當北宋初年。那時，蒙古民族尚未有自己的文字，漢文史籍中也從未記錄過這位祖先的名字。所以，成吉思汗十世祖的名字應當是據蒙古人後來的追憶而譯寫出來的。

用「兒」字來譯音的最確鑿可信的較早史料，當數約成書於十三世紀中葉的《蒙古秘史》。⁸ 蒙古太宗至憲宗時期編成的歷史及文學巨著《蒙古秘史》，一般認為是用畏兀兒字蒙古文寫成的。該書的蒙文有漢文標音，蒙文原文右側標有用漢文逐詞直譯的譯文；每節之後，又有全節漢文譯文。當代學者因此把它當作研究古代蒙古語言珍貴文獻，認為它的價值是任何一部古典蒙文文獻都不能與之媲美的。其實，它又何嘗不是研究漢語史的寶貴資料呢？

在這部蒙漢文並用的文獻中，「兒」被明確並大量用來對應了蒙古語中的捲舌韻尾r音。僅舉數例：安答合兒(andaqar)，意為「做誓」；影吉兒察(inggirčaq)，意為「單鞍」；斡兒合(orqa)，意為「人煙」；納木兒罕(namurqan)，意為「陷泥」；斡兒木格(örmüge)，意為「毛衫」；孛兒(bor)，意為「葡萄酒」。⁹ 這些史料，可以充分證實，至遲到十三世紀中葉，即金朝滅亡之後，北中國廣大地區處在蒙古帝國統治下時，「兒」已作為外來語中r的譯音字而出現在漢語中了。

以上是我們對「兒」最早對譯外來語r音的歷史考察。

⁶ 所引譯名詞例，選引自拉施特(Rashid al-Din)(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一卷第二分冊。

⁷ 周清澍：〈成吉思汗生年考〉，載成吉思汗研究所(編)、沙日靳岱、武占海、劉毅政(主編)：《成吉思汗研究文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8-10。

⁸ 有關該書的成書年代，參考余大鈞：〈《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考〉，《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1期(1982年3月)，頁144-57。

⁹ 所引譯名詞例，選引自額爾登泰、烏雲達賚、阿薩拉圖：《〈蒙古秘史〉詞匯選釋》(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87，110，117，134，127，152。

二、「兒」音的演變是漸變抑或突變？

「兒」音在蒙元時代以前，無[ɛ]音，也從未用來對譯外來語中的 r 音。那麼，「兒」音是如何由古音變作了[ɛ]的讀音呢？不少學者對此做過大量的論證，對「兒」音演變到[ɛ]的過程擬測過各種不同的演變模式。最早由漢學家高本漢提出假設「兒」音有七個過渡音：[nzi] > [zi] > [zi] > [zl] > [zl] > [ʰz] > [ör]，到近年李思敬又提出：[nzi] > [rl] > [ɛ]的演變過程。¹⁰ 毫無疑問，這些學者的意見，對「兒」音的演變做出了極為有益的探索。但是，若對史料進行深入梳爬整理，我們卻不難發現，「兒」音似乎並非如以往學者所認為的那樣，經過了漫長的自身音位的演變過程，才實現了向[ɛ]音的轉變。

「兒」系列字在現代方言裏分成了兩大讀音系統。今天南方的粵語、客家話、汕頭、福州話、溫州話、上海話，同北方的方言對於「兒」以及兒系列字的讀音截然不同。如果拿可以代表隋唐古音的幾個外國譯音——高麗、安南、日本吳音、日本漢音作參證，可以說明，大部分南音還能夠保存兒系列字的古讀音，而北音對於這些字的讀法，無論聲、韻，都去古甚遠。¹¹

對「兒」音的變化，以往的學者自然都是從漢語語言系統本身的發展規律去尋求答案，¹² 但是卻沒有人解釋清楚，為甚麼南北方言本是同一個系統，北音卻發生了變化，而南音卻未遵從同樣的變化規律呢？也就是說，以往的學者並沒有對「兒」音演變的根本原因提出系統的解釋，沒有討論為甚麼「兒」音發生了這樣的變化，而不是發生了另外的變化？為甚麼在北方語言變化了，而在南方卻沒有變化？

把語音變化看成是一種漸變，變化的每一步都是微小的。這種傳統的歷史語言學的看法，一直為人們所相信和接受。認為「語音的變化是不自覺的，由語音本身決定的」，「參預變化的人是看不見的」。但是，西方一些新的語言學理論則從根本上否定了這一看法。新的理論中，有的認為：「可以有意識地推進語音變化，語法因素可能會調整語音變化。根據新觀點，語音變化是觀察得到的，可以控制的。」¹³ 這就是說，我們應當從社會動機、意識及其社會機制方面去尋求語言變化的原因，也就是要解釋變遷的動力和條件。「換句話說，說話人可能為某種目的而改變自己言語的特點——或是

¹⁰ 高本漢觀點為唐虞文所引。參見李思敬：《漢語「兒」[ɛ]音史研究》附錄，頁167；本文，頁156。

¹¹ 唐虞：〈「兒」[ɛ]音的演變〉，頁157-58。

¹² 參見邢公畹：〈對外漢語[ɛ][i]兩音位的教學及[ɛ]音史的問題〉，《語言教學與研究》1995年第3期，頁24-34。

¹³ 理查德·柯茨：〈歷史語言學新天地〉。中譯本收入汪榕培、顧雅雲（編譯）：《八十年代國外語言學的新天地》（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53。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有意識地為改變而改變，或是下意識地追求為社會所接受之更高的戰略目標」。¹⁴ 既然單純遵循語言內部的規律，難以解釋漢語「兒」音變化的根本原因，那麼就應當注意到語言所處的環境、外來因素，以及語言運用者等諸方面因素。

如前所述，「兒」的讀音是蒙元以後，在北方開始發生了變化，那麼，我們不妨考察一下當時北方的社會環境和語言條件。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儲存了在他的土地上曾生息繁衍過的眾多個民族、部落的「基因」，組成了今日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今日的文化，也是在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蒙古族在成吉思汗建國以前，還沒有文字，後來採用畏兀兒文書寫蒙古語，創製了畏兀兒字蒙古文。1269年忽必烈命國師八思巴採用藏文字母創製了「蒙古新字」作為官定的蒙古文，但畏兀兒字書並未廢棄，後來經過改革，更趨完善，一直沿用到今天。蒙元時代，蒙古族統治者極力推廣蒙文、蒙語，企圖以自己民族的文化統治和征服佔領區的各族人民。當時，蒙古族大臣可以不學漢文，而漢人大臣卻非學蒙文不可。這使得在蒙元統治的漢人地區內，在社會的不同層面、不同程度上出現了兩種語言並行的情況。儘管一些漢人史家出於正統觀念或是歧視態度，企圖抹殺一些史實，但史籍中仍留下了在蒙古族當政的蒙元時代，許多漢人能夠使用「蒙語」、「胡語」的記載，這不能不說是蒙古統治者推廣自己民族語言政策的功效。在這樣的一個語言環境下，兩種語言的相互滲透、影響，已是在所難免的了。

蒙古語言屬於阿爾泰語系。根據歷史遺留下來的阿爾泰語系的語音資料來看，中世紀時期的阿爾泰語系與印歐語系同樣，其語音系統中存在著大量的捲舌音。這種捲舌音在中世紀以前的漢語語音系統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恰恰這一語音在這個時期借助著「兒」的音變而進入了漢語語音系統。那麼，我們難道沒有理由說，「兒」所發生的音變，也即變作了捲舌元音的讀音，是來自蒙古語（或由蒙古語所傳遞的西域各族語言，其中有些屬於印歐語系的語言）的影響，或者說是蒙古語中的外來語音的影響嗎？如果是借用外來語，那麼，可以肯定地說，「兒」的這種音變是突變，而非漸變。

「兒」讀音的變化，並不像有些學者試圖去描述的那麼複雜，它不過是向外來語借用了一種語音而已。在遼金幾百年統治中，北方人民經過耳濡目染，對於契丹語、女真語已相當熟悉。漢文為嘗試譯寫 r 音，也做了不少努力。例如，用「魯」、「里」等帶有近似捲舌特徵的 l 聲母的漢字來譯寫 r 音。到元朝，改譯作斡耳朵 ordo 的「宮帳」一詞，在遼、金則一直譯作「斡魯朵」、「斡里朵」。到了蒙古人佔領廣大中原地區之後，大量的蒙古語詞匯進入中原地區，加上與漢語北方語音系統內部的變遷相適應（見下文所述），於是以「兒」來代替以前「魯」、「里」等的地位，更準確地譯寫 r 音，便成為水到渠成之事了。

¹⁴ 同上注，頁56。

在元朝，「兒」字所音譯的外來語，並非都是蒙古語。例如當時中國西部許多地區使用的吐火羅語，就被認為屬於印歐語系；蒙古語本身中也有許多借詞，其中包括了阿爾泰語系中其他語支的語音，諸如突厥語；在蒙古族向外武力擴張，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時期，其統治版圖內包括著眾多的種族、民族及其語言，故蒙古語中也借用了許多來自這些地區和民族的詞語。漢語系統通過蒙古語，而間接接觸了這些語言，在譯音中，也自然有這些語音的痕跡。

當時漢語譯音中出現的「兒」，其語音是為了解譯外來語，也就是說漢語使用者在向外來語借詞。當代歷史語言學家理查德·柯茨曾運用方言借詞的實例來論證過「某些語音變化是從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借詞開始的，這種借詞的發音對借用的人來說是不熟悉的」。¹⁵

這些借來的詞中的「兒」的發音顯然是為了與外來語中的相對應音值相同或相似。因此，「兒」音便發生了違反本系統的語音演變律，這種語音變異是世界其他語言中也曾屢有發生的現象。例如，羅馬征服高盧，拉丁語就代替了凱爾特語成為高盧的語言。可是被征服的高盧人即使採用拉丁語，也是用凱爾特語的腔調說拉丁語。據說，法語裏頭 u 音前移變成 y 就是由於凱爾特語的影響。¹⁶ 有人用同樣的理由來解釋印歐語輔音在日耳曼語言裏頭發生的很大的變化，其中最主要的變化是帶聲爆發音變成不帶聲爆發音，不帶聲爆發音變成不帶聲摩擦音。人們把這些變化歸咎於說日耳曼語的部落所征服的操史前印歐語的民族的某種語言特點。¹⁷

既然自蒙元時代開始，漢語中吸收了大量外來譯音名詞（在此之前，例如魏晉唐朝，漢語中也引進了不少譯名，諸如佛經譯文，卻沒有引起類似「兒」的音變的原因，將在下文論述），我們本應據此便得出「兒」在蒙元時代便已有了捲舌元音 [ʁ] 的讀音的結論。可是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李思敬在反駁唐虞的以中外譯音來求「兒」的音值時說：「憑這些對音材料還只能判斷兒系列字的相對音值而無法確定其絕對音值。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大體估量一下是哪一類音，而確定不了究竟是哪一個音。因為，在不同的民族之間，像“r”、“l”以及漢語的「兒」這一些音，彼此聽起來遠不像[p][p']這一些音那麼明確，那麼容易判斷。所以，唐文所引用的對音材料所反映出來的事實，只能說明那些音大體與漢語當時的兒系列字的讀音相類。」¹⁸

李文的這個論點立足似欠堅強。大量的史料顯示，蒙元以後，「兒」字均用來譯寫外來語中的韻尾 r 音。元代文獻中凡譯名為「兒」字，悉為 ar, or, ir, er, ur 以及與

¹⁵ 同上注，頁50。

¹⁶ L. R. 帕默爾(著)、李榮、王菊泉、周煥常、陳平(譯)：《語言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41。

¹⁷ 同上注，頁42。

¹⁸ 李思敬：《漢語「兒」[ʁ]音史研究》，頁4。

此相類的譯音（r 音尚有用「里」、「魯」等字譯寫），但「兒」字從未用來譯寫其他音，諸如 l 音者。¹⁹ 這是當時的譯音規則。所以，「兒」的對應譯音是相當確定的。

ar, or, er, ir, ur, ür 等音位都是元音加上一個捲舌動作構成。元音 a → o → e → u 之間的差異只在於發音部位在舌面上的略微移動，而其外加的捲舌動作則是同樣的。「兒」字對應的這些捲舌元音，在聽感上其差異是極其微小的。因為借用的外來語音，總要經過固有語言系統的一番改造。如果說因為這樣的差異而難以確定「兒」或兒系列字的讀音的話，那麼今天兒系列字可能依舊沒有將此問題徹底解決。

兒系列字在今天北方方言中，仍然存在著與歷史上相似的不同讀音。例如，在北方有些方言地區，人們把「耳朵」讀作 ar duo, or duo；「兒子」讀作類似 ar zi 的音。就連在大力推廣了幾十年的標準語普通話中，雖然「二」、「貳」的拼音明確標作 er，可是操標準普通話的人也一直讀作類似 ar 的發音。兒系列字讀音的這種不確定性，是由其音色本身決定的，而非表明是其音變的某一階段。

今天英語中 r 前面的許多元音的區別也是被中立化了的。比如，[i]和[I]在許多詞中都有區別功能，但在 -r 前面差不多減少了一半。²⁰ 英語元音在 -r 前面區別功能的大大減少與漢語兒化音的讀音的不確定性，十分相似。

更為有趣的是，今天的「兒」作為「兒化韻」的讀音，在與前面的音節發生合音作用時，所產生的音變現象，也同歷史上語音的不確定現象類似。例如：

前韻尾為 a, ai, an	→	兒化韻讀為 ar；
前韻尾為 uo, o	→	兒化韻讀為 or；
前韻尾為 e, en, ei, ie	→	兒化韻讀為 er；
前韻尾為 u, ui, un	→	兒化韻讀為 uer；
前韻尾為 u, un	→	兒化韻讀為 uer。

而「兒」字的捲舌讀音在歷史上最初出現之時，表現的正是外來語中與兒化韻類似的捲舌音色，而並非一個完整的音節（詳見下文），故其情況與今天的兒化韻讀音正相同。我們能夠說在這些兒化韻中「兒」的讀音只是「一類」音，不是「一個」確定的音，而否定了今日「兒」的讀音[ɛr]嗎？回答如果是否定的，我們就完全有理由認為，在蒙元時期，當漢語借用外來語時，以漢字中原有的「兒」為載體，借用了外來語中 r 這一捲舌音，形成了漢語中前所未有的兒的[ɛr]音。其實，李文不能確定「兒」在蒙元

¹⁹ 韓儒林：《穹廬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53。

²⁰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北京：商務印書館），第十一輯（1983年），附錄一〈關於區別性特徵理論〉，頁88。

時代便已變為與今日[ɛ]相似的音的重要理由，不是上述所言，倒是那個時期歷史遺留下來的大量其他漢語語音資料中，「兒」字依舊屬於支思韻，而且，它還有聲母。²¹

三、「兒」音變的詞匯擴散過程

以往學者在探究「兒」音的演變過程時，幾乎無一例外都遵循著這樣一個邏輯過程：「兒」由中古以前的擬音[nzi]或[nzie]漸變為帶有捲舌色彩的音（如[l]等），再變為完全的[ɛ]讀音，最後形成今天的兒化韻捲舌讀音。這一考察過程也可以簡略描述為，「兒」首先以一個整體音節演變成為[ɛ]的讀音，然後才出現了今日的兒化韻。

筆者的認識與上述的看法恰好是始末倒置：「兒」音的演變是由於它在兒化韻中的捲舌音彩影響，而改變了其作為獨立音節時的讀音。這一過程即為：

兒化韻 r → 「兒」音[ɛ]

阿爾泰語系或印歐語系韻尾的 r，在其本來語言系統中，都只是一個音節的組成部分，並不構成一個獨立音節。它必須與附著其前的元音（或類似元音）共同發音，才能構成一個特殊音彩的音節。²² 漢語系統在借用這些外來詞時，這種音色對於當時的漢語系統來說，是一個截然不同的語音特徵，不能聽而不聞。為了用漢字準確地表達出這一語音特色，人們採用了「兒」（或兒系列字，諸如「耳」、「爾」）來描寫借詞中的這一語音。而這個「兒」在當時所表示的音，是外來語的語音模式，必然要與外來語同樣，只做出一個捲舌的音彩來，並非一個獨立音節。這便是漢語系統兒化韻的開始。

在所有對譯的借用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兒」的前面，必然有一個以元音為韻尾的對應漢字，這個漢字所譯寫的正是對應借用詞 r 前面所代表的元音。毫無疑問，這些元音後面的「兒」，不會再需要獨立的元音作為開頭的韻首音，它只是為了讓說話者做出一個附著的捲舌動作而已。

兒化韻中的「兒」已確定為 r 的讀音之後，漢語系統接納「兒」字作為獨立音節的發音便是不期然而然的事了。因為在各個元音與 r 的組合中，[ɛ]的發音在聽感上最適中。作為捲舌央元音，它與 a, o, i, u 的接近程度相等，可以輕易轉換為[ar], [or], [ur]等讀音。於是，「兒」在脫離了限定的借用詞後，其讀音便以[ɛ]的面貌出現了。這就是說，因為有了作為兒化韻的讀音，「兒」的[ɛ]音性格便相應獨立了。

兒化韻 r 是兒[ɛ]音之母，而兒的[ɛ]音則是兒化音 r 之子。這是本文與以往探討「兒」音演變結論所持的根本不同的意見之一。換句話說，不是「兒」經過長期的演變成為零聲母之後，才出現了兒化韻，而是兒化韻的出現，使「兒」變成了零聲母的。

²¹ 見李思敬的論證，《漢語「兒」[ɛ]音史研究》，頁26。

²² r 在印歐語系的一些語言中代表滾音，本文所談限於其所代表的捲舌音。

「兒」自其在譯名中出現的那時候起，便應有了[ɛr]的獨立音節的讀音，可是，怎麼來解釋同時代的史籍中，諸多令人困惑的「兒」非讀[ɛr]音的材料呢？這裏不妨借鑒一下西方語言學界較新的「詞匯擴散」(lexical diffusion)理論。

上個世紀德國的新語法學派，對於語言演變問題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的許多理論至今仍在歷史語言學領域中被廣泛接受和運用著。這個學派對於語音演變理論上的一個重要觀點是，語音變化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看，一是作為詞匯中的詞，二是作為變化中的語音的不同特徵。他們認為，作為詞匯，要變就都變，因而是一種突變。作為語音，變化是逐漸的，因而是一種漸變。這兩者的關係剛好相反。可是，由王士元於六十年代末首先提出的詞匯擴散理論，則與新語法學派的主張截然相反。詞匯擴散理論指出，在語言演變過程中，語音是突變，詞匯是漸變的。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是，雖然不容易看到語言在任何時候都存在共時變異的現象，比如總是有些詞具有兩個或更多不同的念法，但這種共時變異正是詞匯擴散常常經過的途徑。²³

在一般典型的音變中，有些詞變得較快，有些變得較慢。所以在音變過程中，總是可以把詞分為未變、變化中、已變三類。即有的詞已經完成了變化；有的詞有時讀舊音，有時讀新音；有的詞則根本沒變化。比如英語中由雙字母 oo 表示的元音[u:]在很多方言中在向[u]變，也就是音長縮短了一些，舌位降低了一些。look，讀作[luk]，已經變了；room 有時讀[rɔ:m]，有時讀[rum]；而 food，讀[fu:d]，根本沒有變。這就是詞匯擴散的表現。²⁴

對「兒」音歷史演變的分析考察，可以說是為詞匯擴散理論提供了又一有力證據。r 音進入漢語系統，從而導致「兒」讀作了[ɛr]，正是隨著一個個外來詞的借用而逐步擴散開來的。如上所述，「兒」的音變首先發生在兒化韻上面，然後才延及「兒」的獨立讀音，因此，兒化韻的音變屬於語言學上所說的類推音變。按詞匯擴散理論，在社會上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匯，在類推音變中，音變速度較慢。這可能是由於這些使用頻率較高的詞已經約定俗成，不容易發生類推音變。這就是「兒」字在譯音上已讀作了[ɛr]，而蒙元時代的「兒」字在民歌中出現時均與 i 韻母字押韻，《中原音韻》仍將「兒」字附屬在支思部的原因所在。

李思敬詳細考察了自金元至近代兒系列字在詩歌中的押韻情況。這些現有資料同樣可以作為本文論述的依據。李文考察了諸宮調中用兒系列字與 i 押韻的幅度是相當大的。而在元雜劇中所出現的兒系列字與 i 押韻的比例，據他的不完全統計，為 112:149（已並非全部）。而從明代早期引用的四首用支思韻的俗曲中，只有一個

²³ William S-Y. Wang (ed.),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The Hague: Mouton, 1977), pp. 148-57. 另見《語言學論叢》第十一輯，頁119-22。關於詞匯擴散理論的概述，參見石鋒（編）：《漢語研究在海外》（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年），頁31-47。

²⁴ 《語言學論叢》第十一輯，頁120。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兒」作韻腳字。這個比例數已比元曲時代的比例小得多了。而根據李思敬對清代《白雪遺音》和《霓裳續譜》兩大歌曲集一千二百多首歌曲的考察，則沒有一首北方民間創作兒系列字與含有 i 韻母的字互相押韻的。而對代表現代漢語近期、中期、早期的材料的考察證實，兒系列字是從沒有與 i 押韻的。²⁵

這個統計資料正好提供了「兒」音在其歷史演變中，以詞匯擴散形式進行的過程。「兒」讀[ɛr]的過程，是由一部分詞、一部分詞的音變蔓延開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的演變是漸變的。這個漸變過程並非是由原始音[nzi]→[lr]（[ɛr]的史前音）→[ɛr]，或其他的甚麼過渡過程，逐步把聲音由[nzi]變成了[ɛr]。無論語言學家試圖把這個過渡過程描述得如何細緻，在「兒」脫掉其 i 韻以及其原有聲母（這裏暫不討論其聲母究竟為何）之際，對於每一個具體的詞匯來說，都不能不是一個突變過程。人們要一個詞一個詞地變音；老一代沒變的詞，新一代的變了；那一類詞沒變，這一類詞變了。終於，一直到了近代，北方方言才完成了「兒」字[ɛr]音的徹底演變過程。

我們面對著的是這樣一個漫長的歷程。如果說，今天「兒」[ɛr]讀音的始生時期，或者說「兒」[ɛr]的誕生日，應當回答為在蒙元時期。如果說「兒」[ɛr]的讀音的徹底完成，或者說它的古音在北方方言中徹底消失，則應當在清朝時期。

四、《中原音韻》中的「兒」非[ɛr]音

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另闢新徑，將《廣韻》中本屬日母止攝支韻字的「兒」字，連同其他兒系列字，統統劃歸了支思韻。

主張「兒」在元代時並未變作[ɛr]音的學者，據此認為「兒」與支思韻的其他字同韻，故尚未有[ɛr]的讀音；²⁶ 而主張元代時，「兒」已有了[ɛr]讀音的學者，則認為《中原音韻》將「兒」的由《廣韻》止攝支韻另屬支思韻，正是兒已有了[ɛr]讀音的證明。²⁷ 同一史料，卻引發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結論。

本文則與上述兩種意見相左，即：既主張元代「兒」已有了[ɛr]音，卻不認為《中原音韻》已標出了「兒」的[ɛr]音值。據《中原音韻·自序》可知，該書是作者周德清

²⁵ 李思敬：《漢語「兒」[ɛr]音史研究》，頁14-24。

²⁶ 李思敬在《漢語「兒」[ɛr]音史研究》第一章批評說，趙（蔭棠）先生既在支思部擬音附記中說兒系列字當時「顯係 ɛr 音」，卻又在字表中把兒系列字擬為[zl]，不免自相矛盾。

²⁷ 趙蔭棠在其《中原音韻研究》卷下〈支思部〉附記中說：「韻中兒、爾、二等字與齊微韻的日字本系一音四聲相承，今既分離，在本韻者顯係 ɛr 音。金尼閣將此數字標為 ul，固為明顯，而徐孝將它們列為影母，亦合音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年，頁158）錢玄同對其意見極為贊同，認為此乃「精當之論」。見王潔心：《中原音韻新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附錄〈「中原音韻」審查書〉，頁151-53。

根據當時各名家（關、鄭、馬、白）的戲曲用韻編纂而成的。考察關、鄭、馬、白各家戲曲用韻的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的「兒」依然是與支思部的 *i* 韻相押的。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代語音中，[ɛ] 與 *i* 都沒有押韻的現象，而且兩個音在人們的音感上也是沒有諧和性的。²⁸《中原音韻》從這些與 *i* 韻相押的曲段中，如何能總結出「兒」的音值為 [ɛ] 呢？所以，《中原音韻》沒有指出「兒」音為 [ɛ] 應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既然已經論證了，在元朝時，「兒」已有了 [ɛ] 的音，為甚麼《中原音韻》卻沒有標出這種 [ɛ] 音呢？問題的關鍵是，「兒」的 [ɛ] 音出現於蒙元時期，但其音通行的範圍卻是在包括今天北京在內的北方方言中。可是，《中原音韻》卻沒有代表當時大都（今北京）的音系。它所代表的方言，是當時以洛陽音為主體的河南音。²⁹ 而當時人們所推崇的傳統的中原之音與大都之音是有差別的。元朝以降，明清相繼以北京為都，至清代後期，以洛陽音為代表的河南話的共同語地位才為北京音所代替。³⁰

蒙元時代，隨著蒙古族鐵騎由漠北向南的挺進，蒙古語也是由北方、由蒙漢接觸最密切、時間最早的地區率先輸入到漢語中，然後逐漸向南擴散的。因此，在大都話（北京話）中已借用了蒙語中的 *r* 音之時，中原的「兒」音未必受到這個影響。另外，由於傳統的漢人名流文人階層出於對「蕃」語的蔑視態度（北方少數民族語言遭到一些漢人的抵制是必然的），出於厚古薄今的崇古傾向，對來自於蕃語的 [ɛ]，充耳不聞，在其文學作品中固守漢族文化的陳規，那麼，《中原音韻》沒有反映「兒」的 [ɛ] 音變自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韻·自序一》中就曾借蕭存存之口，詬病當時文人所作曲詞之弊端：「有不遵音調作者；有增襯字作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音者，令人無所守。」³¹ 可見，當時的詩詞戲曲，有增襯字者（兒化音之「兒」即屬此例），字音不相符者（「兒」不讀古音而讀新音者），已比比皆是。

當時的中原音無「兒」的 [ɛ] 音，是符合詞匯擴散理論的。地域擴散應是詞匯擴散的方式之一。當「兒」的 [ɛ] 音在大都地區擴散時，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河南方言中或許根本就未有「兒」的 [ɛ] 音出現，或許有了 [ɛ] 音，但尚未普遍。「一條語音演變律只能管到很小的人羣，那裏的說話基本一致。所以，每一個方言都有自己特別

²⁸ 參照李思敬：《漢語「兒」[ɛ]音史研究》，頁20。

²⁹ 李新魁：《中原音韻音系研究》（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年），頁46。對於《中原音韻》所代表的音系問題，學界依然眾說紛紜，筆者贊同其代表當時河南音一說。

³⁰ 李新魁：〈論近代漢語共同語的標準音〉，載《李新魁自選集》（鄭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150-67。

³¹ 王潔心：《中原音韻新考·附錄》，頁164

的一套語音演變律」。³²「兒」的[ɛ]音至今仍未進入漢語南方方言中，便是一個例證。那麼，當時，還未完全擴散至河南的中原音中去，是不足為奇的。

事實上，「兒」音在漢語系統中的演變過程是以兩條線索平行發展的。如前所述，「兒」音在北方，一方面受外來語的影響和作用，而發生了語音突變過程。而另一方面，唐宋至元這個時期中，在中原以及以南的漢語方言區域，「兒」音在漢語系統內部亦發生了它自身的某些變化。《廣韻》及《中原音韻》中反映的「兒」音由日母止攝支韻字到支思韻的變化，正是其語音在漢語系統已發生了變化的佐證。

蒙元時代，「兒」的新舊兩種讀音是並行的。文人在作詩填詞寫劇時，使用的是「兒」的舊音，而人們在許多日常口語中及在借用詞中，則操著「兒」的新音。在一些蒙漢交流頻繁、蒙漢雜居地區，「兒」音早已變讀為[ɛ]；而在另一些地區，「兒」音仍持續使用著漢語舊音。

蒙古語在反向音譯漢語時，對於依然操舊音或書面語的「兒」音，則依樣畫葫蘆，譯成與[ɛ]音截然不同的漢語發音。如元代八思巴字聖旨碑中，譯「兒」字為 zi。³³但這不但不能證明「兒」字不讀[ɛ]，反而只能說明，在當時，「兒」的新舊兩種音的確是並用的。因為，找不到任何證據，證明已被譯作兒化音形式的蒙古語，反譯回蒙古語時，把「兒」變作了[nzi]或非[ɛ]讀的漢語舊音，而使原本的蒙古語（或其他語）面目皆非。

五、「兒」音變的內在條件

本文論證了漢字「兒」自蒙元開始被借用來譯寫外來語中的r音，因而徹底改變了其讀音。那麼，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為甚麼是「兒」字獲選擔當了這個歷史角色，而非另外的漢字呢？「兒」字發生這個音變，是有其內在條件的。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了作用。

在今天以北京話為代表的北方方言中，兒化詞十分普遍。其基本特點據伍巍〈漢語「-兒」尾縱談〉一文所說大概有五：「一、頻繁地見用於口語；二、『-兒』在詞中已徹底虛化；三、『-兒』附著於前一音節的末尾，僅是一個輕而短的音素，不獨立成音節；四、常帶有說話人的某種感情色彩，往往有區別詞義或詞性的作用……；五、兒化範圍……以名詞居多。」³⁴

「兒」字在漢語中最初完全是當實詞的。《說文·兒部》：「兒，孺子也。」東漢以後，「兒」的詞義漸有了虛化的趨向，有了較明顯的詞綴的意味。至遲到了南北朝時

³² 帕默爾：《語言學概論》，頁36。

³³ 韓儒林：《穹廬集》，頁467。

³⁴ 伍巍：〈漢語「-兒」尾縱談〉，《音韻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第二輯（1986年），頁29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期，「兒」已可以完全虛化了。到了唐代，兒化詞已廣泛見於漢語口語中，這從唐代的童謠、敦煌曲子詞、敦煌變文以及當時文人作品中找到眾多的例證。這些兒化詞中的「兒」字，不同於後位詞綴，已成為詞尾。也就是說，漢語「兒」尾在唐代已正式形成。兒化詞發展到了宋代，則已基本上成熟了。宋代的話本、文集、雜記中，兒化詞的使用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了。根據兒化詞的特點，附著於前一音節末尾的「兒」並不獨立成音節，而只是造成一種音彩，那麼，唐宋時代的「-兒」尾的實際讀音在漢語中是怎樣的呢？伍巍提出，在中古兒化音節中，作為詞尾「-兒」的讀音應作“-n”。³⁵ 對於元代兒化詞在數量上爆發性地驟增，似乎達到飽和程度的現象，他解釋為兩個原因：「一、當時的北方官話系統已基本形成，廣大的中原地帶的語言已基本統一，這給兒化詞的通行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博大場面；二、北方統治者的南下，促成中原地帶的語音發生巨大的變化，舌尖元音使『兒』聲母由前顎位置鬆開，逐漸偏央，朝著更有利於發兒化音的方向發展。」³⁶

伍先生的第一個原因所解釋的元代語言變化的大環境是值得贊同的。正所謂「國家混一，始得以音問相通」。³⁷ 至於其所談的第二個原因，幾乎已接觸到問題的要害所在，可惜伍文把北方統治者南下促成中原的語音變化，亦以「漸變」作了結局：首先一步是要擺脫掉「兒」的聲母，然後，「兒」的舌尖元音逐漸偏央，一步一步向著[ɛ]的方向挪移。過了幾百年，差不多到了明代末年，「兒」的[ɛ]音最終才誕生了。

按照伍先生的論點，既然「兒」音的演變又經歷了那麼長的歷程，這與元初北方統治者的南下，就很難說還有甚麼瓜葛了。實際上，正如前面所述，北方統治者南下所促成的漢語的巨大變化，是把[ɛ]的語音直接注入進了漢語系統中。之所以選中了「兒」作為外來語 r 音的對應物，則是由於「兒」在當時已具備了 r 所有的一些特點：

一、兒化詞在漢語中已形成，且被廣泛應用。而外來的借詞中的 r 音的譯寫，與兒化詞有著同樣的形式。即借詞中的「兒」音，也可以作為一個虛化字來看待，有它和無它對於理解詞義沒有影響，成為借詞中純粹的附加成分。例如，在元朝的歷史文獻中，將今天新疆維吾爾族祖先的一支一般譯寫作「畏吾兒」。《元史·太祖紀》：成吉思汗四年（己巳）春，「畏吾兒國來附」。《聖武親征錄》：己巳春，「畏吾兒國亦都護聞上威名，遂……欲求議和」。可是，與此同時，元朝文獻又常常將「畏吾兒」這個族名譯音中的「兒」忽略不譯。例如，同是《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六年春正月條丙子載：「禁中書省文冊奏檢用畏吾字書。」《元史》列傳中，更有許多「畏吾人」之記

³⁵ 同上注，頁301-2。

³⁶ 同上注，頁302。

³⁷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卷三十四，頁二。

載。這些「畏吾」顯係「畏吾兒」的省略。又，《蒙古秘史》卷十載：「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刺黑等，來成吉思處。」此處之「委吾」亦為「畏吾兒」之省。由這些譯名中，有無「兒」並無關詞義這一事實，可以證實譯寫出的「兒」與漢語中的兒化詞尾的性質相同，只充當一個虛化成分而已。

西方語言中的 r 在轉譯為沒有捲舌音的語言中時，r 忽略不譯是非常普遍的。姑且不說在進入漢語系統以前的漢文譯名中，漢文根本無法譯寫出這個音（即使用其他「里」、「魯」等字譯寫，也未全面顧及 r 的音色特點），就是現代許多語言對 r 的轉譯也有著與中古漢語類似的現象。例如，沒有對應捲舌元音的日本語在譯寫西方語言時，至今仍常常不譯 r 這個音，而採用把 r 前面的元音略微拖長音長的方法來代替 r 的音色。

英文	假名羅馬拼音	日文
worker	waka	ワーカー
number	nanba	ナンバー
major	mezya	メジャー
regular	regyura	レギュラー
doctor	dokuta	ドクター
farmer	fama	ファーマー

在保留了中國古音而無捲舌音的香港粵語中，借用外來語時，也同樣如此。例如，電腦的英語讀音 computer 的尾音，在香港的粵語讀音裏近似「塔」；教授 professor 的尾音，則近似「灑」；工人 worker 的尾音，則近似「卡」，等等。今天的日語、粵語，在仍無 r 音的條件下借用外來語的情況，恰好為 r 音在這些借詞中可以作為純粹的附加成分，是虛化字的觀點提供了論據。這種作為詞尾附加成分、有它無它並不影響語義的性質，導致外來語中的韻尾 r，與漢語系統中已形成的兒化詞中的「兒」尾具有了完全同樣的結構形式。

二、漢語兒化詞的「-兒」尾讀音已具備了改造成為 r 的讀音特徵。如前所述，韻尾 r 在外來語中，都並非一個音節，而只是一個存在於音節中的音素。漢語是音節文字，本來並不具備任何這樣的音素文字，可偏偏就在唐宋以來，兒化詞的大量湧現，導致了詞尾「-兒」的讀音演化成了一種不同於漢語語音的特例，即它並不獨立成為音節，而只是一個音素附著於其他的音節後面（至於它在當時究竟是否讀 -n，限於篇幅，將另文論述）。它的這種語音形式，恰又與外來語韻尾 r 不謀而合。那麼，由 r 來代替「-兒」尾以前的讀音，而形成真正的、今天的兒化韻，不是因勢利導嗎？

三、漢語兒化詞的使用範圍正適合譯寫外來詞的需要。不同語言之間的相互借詞，

都是以借用名詞爲主的。十世紀以後，北方處於契丹、女真民族政權的統治下，至十三世紀蒙古族統一全中國，期間中國處於空前的戰爭、交往、和平、遷徙、民族大雜處階段，導致中原文化，包括語言，受到了各種形式、不同程度的衝擊和浸染。如同一千多年前，法國諾曼地人侵入英國，統治英國一二百年，很多法語詞在這時期進入英語一樣，在遼金元時期，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導致漢語必然吸納許多這些民族的語言。而在吸納的詞匯中，名詞是主要的。包括人名、地名、官名、器物名等等。這些名詞中韻尾 r 的音，正好可以被當時漢語中已經形成的、以名詞爲主的兒化詞中的「-兒」尾來對應。

四、漢語兒化詞在唐朝時已開始頻繁地應用於口語中，而韻尾 r 音在外來語（阿爾泰語系或印歐語系）中頻繁使用的例證更是俯拾皆是。這兩個音素在口語中的應用頻率也是如此相似。

以上從兒化詞的構詞形式、兒化詞「兒」尾的讀音、兒化詞的應用範圍及口語使用頻率等四個方面，分析了漢語中的「兒」尾成爲唐宋時代獨一無二可以在漢語中等同於外來語中 r 的角色。

六、蒙元以前的譯音爲何不使用「兒」？

本文論證「兒」的[ɛr]音是自蒙元時代開始，直接來自於外來借詞的。那麼，漢文譯寫外來語並非自蒙元時代開始，何以在以前的漢文史籍中並無「兒」的[ɛr]音出現呢？

第一，魏晉至唐宋時期，隨著中外交通的日益發達，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也日益擴大，中國人對外族語言的接觸及了解也日益加深。但是，唐宋以前，漢文翻譯外來語的工作，主要限於佛經方面。這些佛教用語，對於國計民生並無直接利害關係，對人民的社會生活自然影響甚微。這些外來語，在漢語口語中較少使用，漢語系統對它的反饋便也相應消極了。

第二，蒙元帝國建立以前，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像蒙古民族這樣統治了如此遼闊的疆土。在元帝國的版圖內，眾多民族共處，民族融合，爲各民族間的語言交流創造了空前的契機。外來語的大量湧進，迫使漢語不得不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這是[ɛr]音進入漢語系統的社會歷史前提。這個歷史條件元以前的中國社會並不具備。

第三，漢語系統自身的發展尚不足夠，「兒」或其他漢語音節均未發展到適合於譯寫 r 音的條件。這便是本文上面所論述過的，兒化詞及讀音的變化，都是到了唐代才開始趨於成熟的。

第四，與外來語頻繁交往的結果，使漢語翻譯水平逐步提高，才出現了更精細地描述外來語音的需求。

在宋以前，人們對外來語的譯寫，因爲受到漢語語音等各種條件的限制，無法精益求精，故連當時人都不滿意漢語譯寫的外來語音。例如，北宋熟諳北方夷情的洪邁就

說：「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為捐篤、身毒；禿髮，語轉而為吐蕃。」³⁸顯然他是不滿於華言對蕃語的有些譯寫不準確。

隨著時代的發展，漢語翻譯水平有了長足的進步。這可以體現在對同一個外來語，在前後不同時代譯寫的不同，而越來越趨向於譯音的近似。例如，突厥語中的「俟斤」，是突厥諸部族首領（酋長）的稱號，突厥語為irkin, erkin。這個稱號是突厥族沿用柔然、鮮卑語而來的。在唐和唐以前的漢文文獻中，都譯寫作「俟斤」，又作「頡斤」、「乙斤」，顯然對其中的韻尾r未作對譯。遼朝建立後，契丹族繼續沿用這個稱號，在漢文卻譯作「夷離謹」；此後金代女真族又沿用契丹制，並改譯作「移里謹」。這個名稱的譯寫雖然沒有使用「兒」來譯寫r，但卻明顯地看出，漢語開始注意了對該語詞中的捲舌音的譯寫，在詞中加進了「里」（這個有趣的現象可以間接為趙元任的兒化音來源的說法，即「兒」化來源之一為「里」提供一個佐證）。再如，突厥語、蒙古語中均有的darqan，「得自由」之意。³⁹《唐書》譯作達幹，中間的r在漢語中沒有表現。在《遼史》及以後的史書譯名中，便譯作「達刺幹」、「答刺罕」，《蒙古譯史》則譯作「答兒罕」。顯係突出譯了其中的r音。⁴⁰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七、小結

本文的主要論點如下：

一、漢語「兒」的[ɛr]音，起始於蒙元時代（至遲到十三世紀中葉），是直接由模擬轉譯外來語中的韻尾r音而產生的。

二、「兒」音由中古讀音演變為現代的[ɛr]音，並非如以往學者所言，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音位演變過程。它的變化是外來語（指中國北方包括蒙古語在內的阿爾泰語系及印歐語系的其他少數民族語言）輸入的結果，因而，其語音變化是突變，不是漸變。

三、並非是「兒」音演變為[ɛr]之後，才產生今天兒化韻的讀法。其演變過程剛好相反，是「兒」作為「-兒」詞尾，在漢語系統在借用的外來語中首先讀作了r，才導致了「兒」作為一個獨立音節的讀音變作了[ɛ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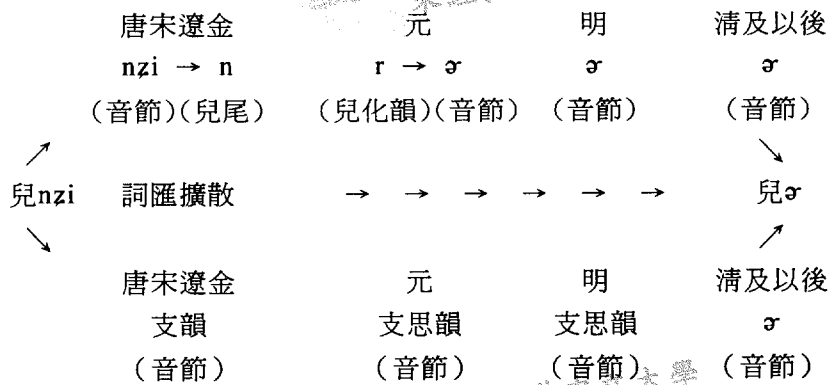
四、兒音[ɛr]的演變，經過了詞匯擴散的過程。這個過程大約持續了數百年的時間，直到清朝，才使兒的[ɛr]音完成了它的徹底擴散，以獨居的姿態佔領了北方方言的全部陣地。

³⁸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卷二百五十三，廣明元年七月胡注引，頁8232。

³⁹ 《南村輟耕錄》，收入《歷代小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卷七十三，頁四。

⁴⁰ 額爾登泰等：《〈蒙古秘史〉詞匯選釋》（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81年），頁278。

五、在兒的[ɛ]音詞匯擴散時期，北方漢語中的「兒」，有著兩種語音並用時期，即：



六、唐以來漢語兒化詞的形成，是「兒」被用來譯寫外來語 r 的內在因素。兒化詞無論從構詞形式上、讀音特徵上，還是在應用範圍上及口語中使用頻率上，都符合了譯寫外來語 r 的基本條件。或者說，外來語 r 的各項特徵，均與當時漢語兒化詞的兒尾相似，故外來語只略加改造「兒」，便取代了「兒」原來的讀音而令「兒」以[ɛ]的面目重現於世。

New Probe on the Pronunciation Transmut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Er*

(A Summary)

Yang Ruowei Zhang Bennan

The suffixation of the nonsyllabic “r” is the only particular phenomenon in the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This “r” is not an independent syllable like al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s just an auxiliary element belonging to the preceding syllable. Its pronunciation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and has become a retroflex vowel.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 *er* 兒 has greatly diversified since ancient times: it went through a lot of changes to become the new pronunciation in Putonghua today.

Why did the character change its pronunciation in northern dialects? How did it happen? When did the new pronunciation complete its change? Was it transformed abruptly or graduall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se questions which have been discussed by man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er* [ɛ] began in China since the time of the Mongolian Empire. In other words, it had emerged in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at least in the midd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 large number of data collected from ancient documents can prove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er* [ɛ] came from directly translating the “r” of a tail vowel in loan words. Therefore the pronunciation was changed suddenly, because the change was caused by the input of an external language.

兒 was read as “r” in the tail vowel first, then the character became the *er* [ɛ] as an independent syllable. The order in this process had not been the other way around as some early academic circles had contended.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er* [ɛ] underwent a process of lexical diffusion. It ran the course of hundreds of years and did not end until the Qing dynasty. After that, the pronunciation of 兒 was taken over by *er* [ɛ]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